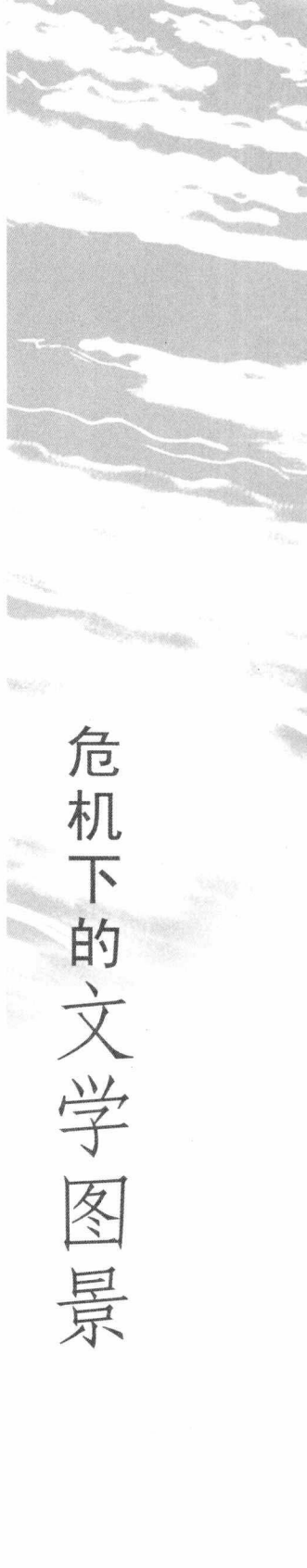


危机下的
文学图景

李海霞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危机下的文学图景

李海霞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危机下的文学图景 / 李海霞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11

ISBN 978-7-5426-3956-1

I. ①危… II. ①李…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 IV. ①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5316 号

危机下的文学图景

著 者 / 李海霞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李 珏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黄钰文

监 制 / 任中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13

书 号 / ISBN 978-7-5426-3956-1 / I · 629

定 价 / 28.00 元

鸣 谢

本书获上海市第三期重点学科
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资助(S30101)

内 容 提 要

本文以 80 年代早期以“现代派”为表征的纯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当时的文学论争、文学理论建设以及文学期刊、文学教育等的运作情况,结合主要的有代表性的个案分析,试图全面展现 80 年代“纯文学”作为一场范式革命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

论文试图突破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中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割裂的状况,在方法上尝试将文学、思想和历史三方面融合贯通,为此论文在探讨“纯文学”范式的发生发展时着重关注了四个方面的复杂情况。第一章我们通过对茅盾《夜读偶记》的详细分析,试图为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观念在理论和事实上的成就与弊端作一全面的呈现,以此为“纯文学”运动在发轫之际就选择“形式突围”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去政治化”策略寻找政治上和历史上的合法性。第二章我们用大量篇幅介绍和分析了当时影响巨大的纯文学刊物《今天》(1978~1980)。通过对它的编辑活动和小说创作的分析,我们将会看到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范式,“纯文学”所蕴含的强大的政治行动力。第三章我们回到主流文学界,首先介绍了西方文学在 80 年代初的翻译和传播情况,然后通过对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以及徐迟“现代派与现代化”理论的分析,呈现“纯文学”理论建设的曲折而复杂的过程;在第四章对新时期文学创作实绩的展览中,我们选择了王蒙和他的“意识流”小说,在此之前,我们先分析了 80 年代之初围绕“现代派”的争论,希望透过“台面上”的论争一窥“纯文学”革命的基本样貌,而随着分析的深入我们将会看到,“纯文学”形式革命的意义和“去政治化”的政治

意味发生了意味深长的转变；第五章“文学教育”部分我们关注的是 80 年代非常重要的一支文学力量——文学青年的创作实践，为此我们选择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小说《寻找》，从中我们能够看出主流文学观念强大的渗透能力。通过这几部分的分析，80 年代的这场轮廓模糊的“纯文学”运动将会得到相对完整的呈现。

Abstract

The early 1980's Pure Literature movement represented by Modernist are the main subjects in this thesis, which have been observed on contesting, publishing, accepting and educating to expl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ure Literature movement. When it comes to research mode, the thesis has tried to get the typical cases into the multiple historical pressures of the Pure Literature, which we take as a revolution of paradigm.

The thesis has been tried to break the divisive status between the interior and the exterior research mode presently, whereas, it has been tried to assimilate the literature, theory and historical context. As a result, there are four main points in the research on the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ure literature paradigm. Firstly, we focus on Mao Dun's *The essay in night reading*, in which the old socialist realist literature method proves directly the legitimacy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Pure Literature movement when it takes the formalist and aestheticism as the power. Secondly, we focused on the big—affecting unofficial magazine, the first pure literature magazine, *Today* (1978~1980). With the observing on its edition and novels, we can find that a new literature paradigm the Pure Literature movement is politically powerful. Then in the third chapter, we turn back to the main literature circle, focusing on the translation and spreading of the western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1980's. Gao Xingjian

's *the initial research on the modern novel technique* and Xu Chi's theory of *Modernist and Modernization* will powerfully present the multiple historical pressures of the Pure Literature movement. Fourthly, Wang Meng's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s are our interest. And then, finally, an important literature power, the literature youth, will prove the very powerful education of the dominated literature notion.

目 录

内容提要	1
导言:范式危机与“纯文学”的发生	1
一、范式危机与“纯文学”的发生——研究对象的提出	1
二、研究现状综述	7
三、几个需要说明的问题及研究方法	12
第一章 社会主义文学对“现代派”和形式主义的批判——以茅盾《夜读偶记》为例	
第一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公式化、概念化” ——《夜读偶记》的创作背景	19
第二节 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夜读偶记》对“现代派”的批判	25
余论 形式、现代主义与纯文学	31
第二章 世变中文学的先锋运动——兼论《今天》(1978~1980)及其小说创作	
第一节 民刊在中国文学体制中的作用 ——论作为文学“先锋”运动的《今天》	35
第二节 历史叙事与文学形式 ——《今天》的小说创作:以万之为例	44

第三节 “纯文学”的政治行动 ——再论《今天》的小说创作:北岛·文学标准	62
第三章 新时期文学的理论突围与“纯文学”的产生	
第一节 “新时期”以来西方现代派文学传播概览	70
第二节 形式启蒙与“纯文学”观念发轫 ——论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意义	74
第三节 文学“现代化”猜想 ——论徐迟的“社会主义现代派”理论	82
余论	91
第四章 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文学“现代派”——兼论王蒙早期的“意识流”小说	
第一节 “现代派”及命名的焦虑	92
第二节 意识流与东方意识流	96
第三节 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意识流”叙述	108
第四节 细节·记忆·历史——再论王蒙的创作	114
余论	123
第五章 新时期的文学教育策略——关于《寻找》及其续篇的完成	
第一节 文学期刊与文学教育	127
第二节 抽象的理想主义与作为信仰的共产主义	130
第三节 红卫兵叙事的代际问题与个人化倾向	136
第四节 续篇: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瓦解	142
余论	147
结语	149
附论一:从劳动者到打工者	153

附论二:新的科学与人性信条的诞生——对新时期改革文学的新认识	159
附表一:主要外国文学刊物重要作品一览表	171
附录一:徐迟创作年谱	175
附录二:部分影响巨大的“内部读物”(文学部分)	178
附录三:《今天》诗歌总录	179
附录四:文学“寻根”论争主要报刊文章编目	181
附录五:“文化热”问题主要报刊文章编目	185
参考书目	188

导言：范式危机与“纯文学”的发生

一、范式危机与“纯文学”的发生——研究对象的提出

1933年，鲁迅先生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借文人雅士的“收藏癖”发难，抨击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兴盛之风。他认为小品文的日趋雍容、漂亮将会令白话文学放下文学革命乃至思想革命的“挣扎与战斗”，最终促使青年们“由粗暴变为风雅”，纷纷“fair play”了。文学之成为摆设，“正如烟霞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蹇到马路上来了。”这样的文学是不会有大有作为的，因而也必定会走到危机里去。“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Krisis）一样，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①这里，鲁迅提出了“生存的小品文”的文学思想，其实也就是他一直以来的“战斗的文学”观念的一个反映，在鲁迅看来，文学繁荣发展不能靠智识阶级和有闲文人的自我欣赏，文学决不能对中国的现实困境“闭上眼睛”；除此之外，鲁迅在此处表达了他独特的“危机意识”。危机意味着死亡，但也意味着新生——革命的目的，就是涤荡历史的“污秽”，促成“婴孩”的诞生。鲁迅对“危机”的这种看法

^①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1933. 10. 1），《南腔北调集》，收《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在中国现代思想中影响巨大,尽管并非所有的革命者和启蒙家都和鲁迅一样抱着“反抗绝望”的深刻性才选择为“婴孩”的革命,但“危机”时刻的辩证法、新与旧的相互依存、转化的哲学命题却是中国这个被迫的后发现代国家最深入人心的思想。“砸碎一切旧机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一穷二白”的国家“画最美最好的图画”、“居安思危”……危机促成革命和不断革命的现代性逻辑,养成了中国文化对“危机”的敏锐嗅觉,并积累了近百年对“危机”深刻体验——中国这个老大的中央帝国,自第一次被迫面对一个完全迥异于自身想象的“世界”之际,便走上了一条“岌岌乎危矣”的求生之路。

中国的 80 年代,同样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邹谠在《中国革命再阐释》一书中,曾开宗明义地分析了这一“危机”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他说,“除了导源于对外战争的新近失败的危机感外,国际环境中的另外两种因素将持续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强化这种危机意识,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这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和范例(现代社会科学术语称之为‘模式’)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冲击。”^① 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虽然为中国文化注入了蓬勃乐观的因素,但“冷战”的紧张氛围却比任何时候都强化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危机意识,甚至我们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也是这一危机心理的畸形发展。只是,它发展的结果,或者说社会主义激进实践的结果,却是另一种更深刻的危机的诞生:“文化大革命遗留给中国深刻的权威危机,许多外部观察家将这种危机描述为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对未来前途的信心危机和对政党国家的信任危机(三信危机)。……对危机作出反应成为中共高层领导的强大动力,推动他们改

^① 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第 1 页。甘阳编,何高潮等译,(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革党的国家制度,改革经济,重新界定政党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①显然,“三信危机”并不仅仅促成了“改革开放”的政治行为,打破权威,祛除迷信,毋宁说是借助高度的“信仰和信任”展开的。真正的危机,其实是在国门开放后不久,由现实的混乱和反思的深入所引发的,它诡异地接通了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文化记忆,^②加强了知识分子自身的“失败感”,可能也导致了某些偏激的文化选择。就文学上的反映而言,人们最不满的现象也正是在这种“面向世界”的比较之后产生的。

另外,在80年代有关危机的言论中,还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转变——除了危机导向新生的辩证之外,危机连接着世界的观点也令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国重新开始思考本国和西方的不同与相同。在许多人眼中,整个人类的20世纪都是“一个充满了危机和焦虑的时代”。只不过在西方,个人的危机和异化是与全人类的生存处境连接在一起的,他们的危机意识有着“形而上”的和个人心理的两个层面的意义;而在中国,个人的危机却总是和国家、民族的危机感联系在一起,“落后是要挨打的!”,中国的危机意识总是体现在伦理和政治层面,“欧洲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意识,使得西方文学把自己的命运直接等同于人类的命运,把所处境遇的病态和不幸直接归结为世界本体的荒谬。而感时忧国的中国作家,则始终把民族的危难和落后,看作是文明进程中一个触目惊心的特例”,但是既然中西方同样面临着焦虑和危机,那便自有其“不容忽视的共同点”——“尤其是像鲁迅的《狂人日记》、《野草》或宗璞的《我是谁》、《蜗居》或北岛的《陌生的海滩》或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这样的作品,从内容到语言结构,

① 同上书。第45页。西方观察家的“三信危机”的言论显然引起过中央高层领导们的重视。胡耀邦在1980年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有一种说法,我们的国家出现了危机,一个叫信仰危机,一个叫信心危机,一个叫信任危机。……如果说有危机,我觉得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以前可以说是一次危机。粉碎“四人帮”,我们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也就是说我们摆脱了这个危机。当然,我们现在还到处可以碰上这个危机带来的后遗症。但现在我们是不是还处在危机之中呢?危机这个话是不能轻易地说的。危机者,摇摇欲坠,快完蛋之谓也。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摇摇欲坠了?快完蛋了?我不相信。我说我们的党现在不是什么危机,恰恰相反,我们是恢复了生机!充满着生机!(《红旗》,1980/12—13)“文革”之后中国社会的重重危机被胡耀邦巧妙地转化成“如何面对黑暗面”的问题,但“充满生机”的言论也不应该被看作是安抚民心的政治辞令,四五运动及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民众对粉碎“四人帮”所表达的畅快淋漓的快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人对新时期的热切期望。

② 参见甘阳:《80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北京)《读书》1986年第2期;黄子平:《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北京文学》1986年第5期等文章。

都具有与 20 世纪世界文学共同的美感特征,尽管其内心的焦灼彻头彻尾是中国的,然而却是‘现代中国’的。”^①在“世界”和“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来讨论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危机问题,在心理上或可称为“反败为胜”^②;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却是中国在重新思考其政体、文化以及社会性质等的普遍性、特殊性问题。人们通过这样的途径,否定了曾为革命理想主义所激荡的那段没有“危机”的历史。应该说,80 年代的危机意识是更为乐观的,它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通过这种有所排除的“普遍性”话语模式,将自身同世界历史联系到了一起。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人们在 80 年代最初提出“文化”概念的时候,是在“一般文化”意义上使用它的。在“普遍人性”、“共同美”、“主体性”等哲学、美学讨论背景下,“文化”承担了抵制集权观念的思想解放的任务。但正如上文对“危机”观的分析所示,解放了的、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念迅速发现了自身的“特殊性”。国家的、性别的、民族的、地域的——这些带有明确身份归属的“文化”观念挑战了人们的“去政治化”梦境,文化,这个“曾经一度被构想为一致性的领域已经被转变成了一个冲突的地带。简而言之,文化已经由解决办法的组成部分一跃而成了问题的组成部分。文化不再是解决政治争端的一种途径,……而是政治冲突辞典本身的组成部分。”^③这种冲突使知识分子陷入了相对主义的糟糕境地,他们发现在盲目的“多元化”之后,社会危机发生了转移:由单纯的二元对立转向多元内耗,这样就使得统治权力“不是只有一个反对者,而是有着一群混杂的、不团结的敌人。”^④对中国社会而言,这无疑是非常危急的事情。^⑤

与权威危机和文化危机相伴而来的,刚获解放的新时期文学在迎接所谓的

① 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二十世纪文学三人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② “反败为胜”是历史学家史景迁在评价中国 80 年代的文化心理时使用的词语。参见他的《从共产主义到市场经济》,(台北)时报文化 2001 年出版。

③ [英]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第 44 页。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④ 同上书。第 49 页。

⑤ 而更危急的事情,却是在“共产主义”理想丧失之后,作为底层(第三世界)的“中国文化”如何抵制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统一”的现实。詹姆逊相信“社会主义日常生活”或许可以发展出一种力量,大卫·哈维坚信资本主义经济自身的毁灭性,李泽厚寄希望于一种修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而罗蒂坚持认为物质富裕的西方社会才真正有可能提供一幅“想象”的图景……所有这些观点背后其实都表达了一层意思,那就是文化本身其实是没有力量的,什么可以称为“文化”那是要由经济、政治说了算的。所谓的“多元化”“自由主义”背后活跃的是一个帝国的权柄。

“黄金时代”的同时,其自身也陷入了深刻的不安和困惑之中。文学究竟是什么?文学该往前看、向后看、向内转还是走向世界?面对文学创作表面的繁荣,批评家却开始对越来越多的“技巧的现代派”产生不满(现代派),对文学表现的“传统”、“复古”风格感到厌倦(寻根派),对现实主义一派的美化和讴歌据理力斥(改革派),对文学“向内转”将会丧失的阵地感到忧虑(自我派)^①——人们尤其认为以“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为代表的主流文学在文学创作模式上少有突破,所谓“政治上反对四人帮,艺术上模仿四人帮”。以“改革”文学为例,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颠覆性的社会运动在文学中却总是受到简单化、公式化的反映,“例如为了突出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就常常给改革者安排一段过去被错划为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经历;为了强调清醒的历史意识,改革者又往往是富于雄辩才能的思想家;为了添加一些人情味,改革者又免不了要陷入一场爱情纠葛等等。于是,某些作品中出现的改革者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姓张姓李,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激情、他们的语言竟然相差无几!”^②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显然,在传统的“文艺工具论”^③的框架之下,人们所能寻求的解救之道已经越来越少,新时期文学已经面临一场颠覆性的革命。

于是,人们开始呼吁:“作家与评论家应该共同来总结新的限制,确立新的小说规范。”^④对文学创作“新规范”的吁求表现了原有的文学范式已经丧失了其权威性存在的根基。这一范式虽然同样在进行着积极的调整,但“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已经令习惯于在旧范式范围内提出和认识问题的人感觉“气闷”

① 参见刘晓波:《危机!中国当代文学面临危机》,(深圳)《深圳青年报》1986年第1期等文章。李陀在《1985》中也说:“文革”以后,最初是“伤痕文学”受到全社会的认同和喜欢,批评界当时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文学发展(所谓“新时期文学”),把它看成是“拨乱反正”在文学领域的具体实践,具有非常的创新意义。但是我一直对这种写作评价不高,觉得它基本上还是工农兵文学那一套的继续和发展,作为文学的一种潮流,它没有提出新的文学原则、规范和框架,因此伤痕文学基本是一种“旧”文学……。

② 周介人:《历史感一议》,文艺报1984.11。

③ “文艺工具论”在“文革”结束以后也经历了多次修改,1978年茅盾在文联三届三次会议上,重新阐释了毛泽东1963和1964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以取代或修正之前“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但是许多人不同意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删去,1979年《上海文学》率先提出应该从根本上剔除文艺工具论,最终,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文艺政策被确定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参见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以及《人民日报》,1980.7.26社论和《上海文学》1979年相关评论和讨论文章。

④ 周介人:《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文学自由谈,1986.1。

了。正是在这样峻急的时代背景下，“纯文学”发生了。

“范式”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在库恩的分析中，“范式是某一科学群体在某一阶段内对所提出的问题和进行科学探讨时所使用的的一种共识”，“在科学史上的一些关键时刻，比如从牛顿物理学到爱因斯坦物理学的转换中，这一共识就会被当时存在的范式所不能提供的新的解释要求所打破。经过一段时间的危机之后，整个解释宇宙的思想与方法的框架就会被迫改变，以适应新的解释所提出的要求。因此，库恩的范式不是把科学权威定义为客观真理的权威，而是定义为出自共识的解释，即科学的权威来自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科学群体里的每一个人都按照同样的游戏规则来玩游戏。”^①简言之，库恩“范式”理论意味着“客观真理的权威”并不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数据积累而进行的，而是依照“科学共同体在任何一段时间里，在确切地阐述问题和选择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时，所认为的理所当然的典范性理论的指导而有组织地进行的。”^②一旦越来越多的重要问题都不能在现有的范式范围内得到解释，科学共同体就会逐渐抛弃旧有的范式。而对旧有范式的不满和质疑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科学革命”就爆发了，革命的爆发意味着新范式的产生，也意味着一套重新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产生。“范式”理论强调“共识”而非“权威”，在一个“权威”出现危机的时代，共同体对“共识”态度将决定事情下一步的发展。^③按照库恩的理论，我们可以理解80年代何以产生那么多的争论，那样一个充满着范式危机的动荡的时代，原有的“共识”显然已经不足以确立自身的权威性。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纯文学”作为一个新的“范式”出现了。的确，一个为今日批评家所忽视的问题是，80年代“纯文学”提出之际，正是文学“危机”感浮现之时。新时期文学经过“朦胧”期的破旧布新之后，并没有迎来理所当然的“黄金”的丰收。“究竟什么叫小说？究竟什么叫文

① [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第11—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② 同上。

③ 在80年代普遍的危机意识下，《走向未来》的“编者献词”很好地表达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改革力量对寻求新的阐释范式的迫切愿望：“20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我们）力图从世界观的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性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走向未来·编者献词》，三联出版社1986年出版。